

夹缝中的“民族寓言”

——《温故一九四二》的双重叙事及其隐匿性

朱兆斌¹, 陈思²

(1.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2.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以取材于历史事实的非虚构性叙事在他的作品中独具特色。这部作品以河南大饥荒为背景建构了一个“民族寓言”, 其中浓缩了部分中国人的生存境况与精神生态: 在其生存境况中, 充满了饥饿、挣扎与死亡; 而在其精神生态中, 则充满了迟钝、利己与遗忘。这一“民族寓言”被置于宏大历史叙事与宏大政治叙事的夹缝之中展开, 并在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河南地区的大饥荒中突显了其自身的意义。宏大历史叙事使底层百姓逐渐遗忘其在历史灾难中的挣扎, 而宏大政治叙事则使人民利益在政治目的之中被忽视。在这两种宏大叙事之中, 人民的微观生存与西方的正面作用常被隐匿。这部作品具有历史纪实风格的叙事与上述两种宏大叙事产生对抗, 揭示出宏大叙事对微观层面的个体生存状态与精神生态的遮蔽作用, 并清晰地标识出西方因素的位置与作用。刘震云在作品中对双重宏大叙事“祛隐匿化”, 使“民族寓言”得到了完整呈现, 从而使人们得以直面更为真实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

[关键词] 温故一九四二; 民族寓言; 宏大叙事; 隐匿性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0)01-0075-06

《温故一九四二》(1993)以取材于历史事实的非虚构性叙事在刘震云的作品中独具特色: 一方面以严肃的真实历史为叙述对象, 使其具有立足史实的历史反思意义; 另一方面将调查、资料、评论引入叙事之中, 从而具有直接与读者共视历史与相互对话的特征。2012年, 由冯小刚执导、刘震云编剧的《一九四二》上映, 并成为当年国内最受关注的电影之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并不是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格局中构建的, 而是在广阔的世界格局与全球浪潮中不断建构、确认与反思自身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以及据此拍摄的电影虽然以国际战争为背景, 还提及不少国际事务, 并引入了一些外部视角(如西方记者、传教士), 但自始至终将镜头深刻地聚焦于乡土中国之中百姓的生存与命运。因此, 虽然这部作品容纳了从底层百姓到高层领袖、从中国人民到西方记者在内的广大群体, 但其唯一主角始终是乡土中国的底层百姓。在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与几十年后人们的反应的描述中, 刘震云建立了一个凝聚部分中国人的生存境况与精神生态的“民族寓言”, 而电影《一九四二》则将这一“民族寓言”以图像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一“民族寓言”是被放置在宏大历史叙事与宏大政治叙事的夹缝之中展开的; 在双重的宏大叙事之中, 又具有双重的隐匿性, 即人民的生存细节与西方的历史作用被隐匿了。在对“民族寓言”的建构之中, 这双重的隐匿性被拆开了, 使人们得以直面真实的历史。另外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谓“民族寓言”不宜与美国学者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提出的“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混同。他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以鲁迅等为例指出: “对第三世界的文本而言, 即使那些看起来非常个人化并充满了力比多动力的文本, 也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着政治含义: 个体命运的故事总是第三世界公共文化和历史遭受攻击状态的寓言。”^[1] 本文所讨论的“民族寓言”并不关注詹姆逊所赋予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的政治意涵, 而仅指在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河南地区的大饥荒中呈现的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寓言性, 而这种寓言性在宏大历史叙事与宏大政治叙事

[收稿日期] 2019-05-20

[作者简介] 朱兆斌(1994—), 男, 河南新乡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

陈思(1993—), 女, 河南郑州人,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学科语文与教育学。

的夹缝中更加突显了其自身的意义。

一、宏大历史叙事与遗忘

《温故一九四二》的内容与表达,深具历史学的纪实特征。然而,历史本身并非“纪”出来的,因为其本来就存在着。一旦“纪”,历史就必然丧失其原初意义上的真实性。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说:“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2]历史本来是非叙事性、非文本化的,而一旦以文本的形式被叙事或“纪”出来,就呈现出主观性与文学性风貌。宏大历史叙事,便是一种主观性与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宏大历史叙事是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描述与概括,不仅从未在现实的历史书写中消失,还深深潜藏在人们的心理底层。显然,这种宏大叙事对微观层面的个体生存状态与精神生态具有遮蔽作用。《温故一九四二》虽非对宏大历史叙事的直接反思,但却对这种宏大叙事构成了挑战。

刘震云以调查的方式展开对1942年大饥荒的温故,他的调查对象均是这场灾荒的亲历者。第一位调查对象是姥娘,当被问及“五十年前”这场灾荒时,她的反应是:“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3]431}姥娘已九十二岁,与20世纪的中国同命运,她经历的苦难之多,已经使她不足以将1942年的大饥荒格外牢记于心。这同时意味着姥娘的人生已经汇入了宏大历史叙事之中,并在内心积淀为宏大历史的“无意识”。后来他寻访到范克俭舅舅,后者的第一反应是:“俺家烧了一座小楼。”^{[3]435}然后他记起了大旱,其后是“起蚂蚱”,最后才是饿死了多少人。可见,宏大的历史进程浩浩荡荡驶过,给他留下来的最重要的记忆乃是自己的切身利益。下一个调查对象是当年的县委书记,当有关1942年的问询在他耳畔响起时,他的反应竟是:“那时方圆几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十八岁!”^{[3]436}在这些调查对象眼里,1942年的大饥荒似乎并非那么严重。难道这场灾荒真的没那么严重吗?

在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中,受灾人口达1200万人,其中大约有300万人死亡。在电影《一九四二》中,这一数字被直接打在屏幕上而得到突显。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840万军事人员和130万平民死亡;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人员和平民的死亡人数则分别增加到了1690万和3430万。^[4]对比这些数据,即可见河南大饥荒的严重性。刘震云并没有直接陈列这些数据,而是选择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方式追溯历史,即翻阅陈旧的纸质资料。第一个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资料是当时《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高峰的一篇报道——《豫灾实录》。在这篇报道中,记者展现了1942年惨不忍睹的灾难场面:吃树皮(树叶吃光了)、吃毒草(明知有毒)、吃柴火成为尚未饿死的人们的日常饮食,而社会则回到了无物交换的时代,人们甚至开始贩卖子女妻儿。可见,并非历史不惨痛,而是被调查对象们遗忘了。

某种意义上,那些关于历史的审视与反思,那些关乎终极意义与价值的关怀,是属于知识分子(乃至其中更小的一群)的,底层百姓奉行的是另外一套逻辑。正是这两种群体之间思维逻辑的背离,才导致了满怀知识分子情怀的刘震云在调查之中屡屡不畅。对于底层百姓而言,当然最关心的是切身利益,深刻的思考则过于不切实际。譬如花爪舅舅在逃荒时被抓去充军,在战场上逃跑了,此后他十分后悔。“我”的理解是:兄弟们很多都在战场上为国牺牲,自己却逃跑了,确实应该后悔。然而,其后悔的原因竟是如果当时不逃跑,后来随国军到了台湾,自己就成了有钱的台胞。他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村里的王明芹便由于没逃跑而如今成了台胞,“带着小老婆,戴着金壳手表,镶着大金牙……”^{[3]448}风光地回来了。当然,现在我们已然对反思历史与关怀意义达成了普遍共识。这里并非要反对这些共识,而是说,底层百姓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心理逻辑并非以反思历史与关怀意义为上,而是关注实实在在的切身利益。

另外,刘震云意识到,遗忘对于底层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些受难的底层百姓对过去灾难的遗忘是“非历史”的,这确与牢记历史的惯常口号相悖。然而,每个受难的底层百姓都需要这种遗忘,因为“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5]6}。尼采(Nietzsche)这句话说出了人的生活与历史的一种隐性关系:“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5]1}当苦难的历史对受难者的未来生活造成障碍的时候,对于受难者而言,遗忘并不是可耻的事。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当“我”追问细节时,花爪舅舅愤怒地说:“人家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3]450}这句话确实引人深思,使得“我”意识到:“我在揭亲人和父亲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他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3]450}在对待人们的记忆和以记忆反对遗忘进而拆解宏大历史叙事时,刘震云是犹豫的。

当我们拉远视线,会意识到,与河南大饥荒同时,整个世界都处于死亡的阴影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开始,被德国攻占之地自然血流漂杵、哀鸿遍野。即使是德国,也逐渐蒙上死亡的阴影。1940年至1945年,英美对德进行战略轰炸,多座城市化为废墟,造成上百万人死亡,使得七百万人无家可归。这种地毯式轰炸不仅意在摧毁德国的基础设施,还意在逼迫德国投降。然而,这种轰炸虽然在战争之中具有一定成效,但却以大规模军事人员与平民的死亡为代价。法西斯主义当然是不正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切行为都是正义的。在以胜利为第一原则下,死亡成为必不可少的代价。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也处于20世纪中期世界范围内的死亡阴影之中。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当时中国政府对河南大饥荒的反应与应对不仅与国内局势关系紧密,还与世界局势难以分开。《温故一九四二》小说及其电影版多次提及的国际局势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因此,河南大饥荒中的微观个体实际上关联着宏大的世界局势。正是这种关联,使大饥荒中的个体生命在风起云涌又“大而化之”的历史中被遗漏。

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明确表达过自己的历史观:“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遗忘的。”^{[3]432} 大而化之,筛选与遗忘,这正是宏大历史叙事在背后起作用。然而,底层百姓的挣扎就能这么被遗忘吗?当然不是,刘震云这篇作品本身便回答了这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宏大历史叙事是以“纪实”来呈现自身的,刘震云对这种宏大叙事的拆解也是通过“纪实”来实现。“纪实”在当代中国文学与电影之中意义非凡:不仅文学中出现了“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与大量的报告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纪录片运动”在电影领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新纪录片运动”为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提供了一种能够抗衡“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语言,在“第五代”导演在一些电影中虚构或想象中国的时候,贾樟柯以高度现实的影像语言向观众呈现了更加真实的当代中国社会。有趣的是,作为“第五代”导演之一的冯小刚正是在电影《一九四二》中以一种对当代中国历史的“纪实”来突破他那些商业喜剧片的。

二、宏大政治叙事与死亡

如果说宏大历史叙事广泛存在于人们的历史书写与心理底层,那么宏大政治叙事则主要存在于政治家的观念与计划之中。宏大政治叙事往往由政治主导者操控,其作用在于:一方面以一种政治期许赢得民众之心,另一方面以一种看似合乎政治正义的姿态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宏大的政治叙事并不等同于现实之中的政治实践。在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正是一种冷漠的忽视与惨烈的死亡使宏大政治叙事解体了。

在宏大政治叙事中,人民在政体之中通常占据着至高位置。而在1942年的河南,人民却成了被弃之不顾的一群。在这里,“人民”一词几乎成为一个可以被宏大政治叙事随时征用的空洞的话语符号,只有在某种官方言说中被利用,但却无法在被承诺的意义上落实。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秩序之中,灾民成为一种无分者。他们承担着“人民”的空名,但却难以真正获得这种被归属其身的属性。在法国哲学家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看来,无分者的存在意味着“治安”(police)秩序之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le),正是这种不可共量性打乱了“治安”的平衡。但是,作为灾民的平民是无法发出声音的,用朗西埃的话说:“平民之所以不会说话,是因为他们没有名字、不具备话语。”^[7]换言之,平民不仅难以自己发出声音,还是无名的存在,因而只能被代表。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为河南灾民向蒋介石进言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就是灾民的一个代表。

为了突显作为人民的灾民之处境,刘震云将其放在了双重的比较之中:第一种比较是人民与领袖的生活处境的比较。在领袖的餐桌上,没有被灾区人民视为食物的树皮、毒草和柴火,而摆放着西餐与各种中餐的菜系品种。在刘震云作品中,领袖处于一种特殊的阶级,领袖的衣食住行均与普通百姓有着天壤之别。领袖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尽管在极端危险的战争时期,他们也是最安全的,因为“世界上最后一颗炮弹,才落在领袖的头上”^{[3]440}。第二种比较在于百姓事务与国家的其他政治事务之间。在电影《一九四二》开头,刘震云的旁白便直指这一问题:“1942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在刘震云看来,当时作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并非不知道河南大饥荒的严重性,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愿意公开承认。因为此时,被他视为更重要的可能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事情聚集: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对日战争问题(如军队粮饷问题),国民党内部斗争问题,等等。在此,作为领袖的政治家不会在意区域性的人民灾难,而会认为“死掉一些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处理稍有不慎,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3]443}。在此,政治的利益与人民的直接利益发生了冲突。“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

界向何处去？他们（指人民——引者注）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3]447}刘震云在此揭示，政治家的考虑与芸芸百姓的实际考虑是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正是这种冲突，使得民众的政治期许在宏大政治叙事下成为泡影。从政治大局来看，人们无法简单地指责政治家；而从百姓的立场来看，正是政治家的大局观使得民众的生命成为被忽视的对象。显然，刘震云无意于从高度理性的政治大局视野为政治家辩护，他想指出的是宏大政治叙事对民众生命的忽视。

不过，虽然人民事务在与国家的其他事务的比较中被忽视了，但却和这些国家事务中的国际事务发生了联系。第一个联系是：美国国务院曾决定邀请《大公报》主编王芸生访美，蒋介石政府积极支持。然而，当王芸生发表过对《豫灾实录》的响应性评论之后，蒋介石便立即阻止了其访美计划。第二个联系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将其对河南大饥荒的报告与拍摄的照片发至美国，一时震撼美国新闻界，使得蒋介石政府不得不采取救灾策略。从因为其他国家事务而被忽视，到因为其他国家事务而被重视，河南大饥荒的人民事务始终没有被放在第一位置进行考虑，而只是随着政治需要起伏变化。易言之，在宏大的政治问题面前，这种区域性的人民事务是不被政治家重视的。

《温故一九四二》在比较之中对人民事务处境的揭示，展现了一种现实的真实性。1942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John Service）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陕西省的军队所需便是由该省供给的，而“在陕西省的四十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3]445}。在此，人民的利益服从于政治的意图，这倒置了现代民主政体对二者关系的设定。刘震云在叙述过《大公报》被停刊三日之后，质疑道：“委员长提倡‘民主’和‘自由’，这不和他的口号相违背、公开压迫舆论了吗？”^{[3]462}这里似乎传达出这么一个信息：对所谓人民至上、民主、自由等的标举，其实都是一种政治策略。当这些口号与真实的政治目的发生冲突时，那便可以无视这些政治承诺。易言之，这是一个政治社会，尤其对于政治家而言，政治社会意味着政治目的至上。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3]480}一九四三年，日本军队进入河南。一方面，他们杀人如麻，犯下滔天罪行；另一方面，他们出于政治阴谋收买民心，发放军粮，并且收买地方民团，扩大伪军力量。在河南战役期间，民众们仍然记得同胞军队在灾荒之中是如何敲诈勒索他们的，因此，在日本人的鼓动下，一些人把自己武装起来，攻击自己的同胞军队。站在宏大的政治叙事角度看来，这些人帮助外敌，无疑变成了卖国贼。白修德曾采访一位军官，并指责他们横征暴敛。而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3]480}显然，这是立足“大局”的惯常思路。然而，在受到直接伤害的百姓这里，并不能简单地推出这个结论。宁肯饿死也要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去当亡国奴呢？这一重大的伦理问题是受难百姓无法回答的，而在他们行将饿死之际，一部分人选择了后者。在此，刘震云并没有对此进行评价，他要揭示的是普通百姓的生存困境。

在大饥荒之中，灾民们面临的是令人绝望的处境。在逃灾之路中，灾民们在希望连续破灭之后只剩绝望，他们再也无暇做白日梦。白日梦是消除匮乏的梦，是通向更美好生活的梦，用德国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的话说：“白日梦使人获得勇气 and 希望。”^[8]正是白日梦的希望功能，使人在获得勇往直前的意志之际成为站立起来并对现实与未来做出反应的主体。但是，对河南大饥荒的灾民而言，他们在逃灾之路上根本无暇做白日梦，绝望使他们不再是一个像往常那样面对现实与未来的主体。他们所作的任何选择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主体所应作的选择，而是一个绝望的主体在被动之中被促逼出来的反应。

三、“祛隐匿”与“民族寓言”

刘震云是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中建立“民族寓言”的，其中浓缩了部分中国人的生存境况与精神生态：在其生存境况中，充满了饥饿、挣扎与死亡；而在其精神生态中，则充满了迟钝、利己与遗忘。这一“民族寓言”在宏大历史叙事之中是难以被揭开的记忆，而在宏大政治叙事之中则处于备受忽视的位置。易言之，在这两种宏大叙事之中，人民被隐匿了。此外，另一个被试图隐匿的，则是西方——准确地说，是西方对中国起到的正面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西方，并非指整体性的西方，而是指作为个体的西方人与宗教组织，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教会中的教士。

西方之所以被隐匿，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本位立场，一种民族主义激情不容西方在本国占据高位；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后殖民主义的兴起（日后才起作用）。后殖民主义虽然试图揭示东方与西方的不平衡关系，但

却强化了东方与西方对立性。因此,尽管西方对中国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也常常基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将其隐匿掉了。因此,《温故一九四二》对西方的“祛隐匿”便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正视了历史中西方对中国起到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对当下后殖民主义的某些偏颇之处起到了纠正作用。

西方,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具有两个重要作用:其一,援助中国人民的作用;其二,审视中国现状的作用。

援助中国人民,也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外国记者与媒体的积极参与,才使得政府必须处理河南大饥荒的问题。刘震云感叹道:“这时,唯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3]455}这倒不是说中国的记者与媒体没有关心,而是没有发挥切实的作用。比如上文提到的《豫灾实录》便是《大公报》记者写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篇报道和后续的评论才使得《大公报》被政府停刊三天。第二部分是西方对中国还进行了实际的援助。刘震云写道:“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侵略的——在委员长动作之前,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3]469}这种援助行动不包含任何政治意图,而是从纯粹的宗教教义出发的。他们广泛设立粥厂,开办了教会医院,还设立了孤儿院。“我”从五十年前一期发黄的报纸上,看到一位外国天主教神父谈援助的动机。他说:“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3]470}在此,刘震云设置了一个意图明确的对比:中国当时的政府官员首先从救灾款中扣除农民的欠税,有些官员甚至将救灾款存入银行生息。结果是河南人民并没有得到妥善救济,他们仍然处于死亡线上。此外,中国当时的官员如汤恩伯也开办了孤儿院,用来收留洋人收不完的孤儿。然而,白修德经过调查后发现这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孩子在这里死了,就抬出去埋掉。

西方对中国现状的审视,也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审视中国文化。审视中国文化,当然并非指审视中国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或风貌,而是审视展现在中国人行为处事之中的文化心理。美国驻华外交官谢思维曾写道:“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3]445}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谋私利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而是说,在当时,谋私利的确反映了中国的文化状态。第二部分是评价中国现状。在此,这种评价主要是就河南大饥荒而言的。西方人对河南大饥荒得出的结论是:“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3]468}这一判断当然也需要讨论,但在当时的中国媒体被压制的情况下,这一域外之声值得我们重视。

总之,在对宏大历史叙事下的挣扎与遗忘、宏大政治叙事下的忽视与死亡的揭示中,刘震云拆解了宏大叙事对人民的微观生存的隐匿;而在对大饥荒中西方对中国的援助与审视的凸显中,他又拆解了宏大叙事对西方的正面作用的隐匿。就前一种隐匿而言,其不仅源于当时的政治局势的严重性,还源于内蕴于宏大叙事之中的整体性与总体性思维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建立了宏大整一的历史书写,还潜伏于人民的无意识之中。就后一种隐匿而言,则多源于本国本位立场或民族主义情绪、后殖民主义的惯性思维等。在刘震云对大饥荒的叙述中,这些隐匿性均被拆解了。这不仅使历史得到更加真实的展现,还使历史中的“民族寓言”得到更加完整的呈现。

如果说宏大历史叙事与宏大政治叙事使“民族寓言”处于夹缝之中,只有通过“祛隐匿”才能使其真实面貌呈现出来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却又以另外一套逻辑与这种“民族寓言”中的人发生着冲突。当寻访到蔡婆婆时,“我”差点被他的儿子毒打一顿。这是因为蔡婆婆在逃荒时被爹娘卖掉,以此保全了她的两个弟弟。人贩子把她带走后,又转手将她卖到了窑子里,五年之后才逃出来。她五年的非人生活潜藏在自己的内心,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她的那段生活突然被人关注:一些写畅销书的人纷纷来采访,于是诞生了一本名为《我的妓女生涯》的自传性畅销书。这么多人来采访,刚开始她和家人还觉得兴奋,但后来发现:那些人关注的并非她,而是以她的经历为噱头去赚钱。因此,她和家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可见,现代社会发展至今,仍然未给予这些受难者充分的尊重。相反,却以一种属于现代社会的金钱逻辑又一次侮辱了她。

如果这展现了当代社会的第一套逻辑的话,那么另一套逻辑则深具旧时代的权力逻辑的特征。当“我”走出了蔡婆婆家,来到了乡派出所,“我”把无法采访蔡婆婆的事告诉了身为派出所副所长的小学同学。他的反应是:“这事你本来就应该找我!……我把她提来审一下不就完了?……她是妓女,正归我打击,我怎么不可以提审?”^{[3]454}在此,权力的逻辑出现了。《温故一九四二》不仅具有历史反思意义,还内蕴着对当下的忧虑。这似乎暗示着,“民族寓言”在宏大历史叙事与宏大政治叙事的夹缝之外,还面临着另外一种夹缝,比如现代社会中的金钱逻辑与权力逻辑构成的夹缝。易言之,在以往,“民族寓言”处于宏大历史叙事与宏大政治

叙事的夹缝之中;而如今,“民族寓言”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解决。不仅如此,金钱逻辑与权力逻辑还在按照自身的诉求而构建着现代社会中或隐或显的某种秩序。

就在冯小刚开拍《一九四二》的前一年,即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日本而位居全球第二。同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的工业体系体量巨大,具有门类齐全、独立而完整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农业体系也是如此,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吃”的问题,还在朝着新的生产链条全方位发展。在1942年大饥荒发生地河南,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以“中原崛起”为口号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国面临的问题早已不是在求快中实现“雪中送炭”,而是在求好中力图“锦上添花”。显然,无论是河南,还是整个中国,1942年那种“吃”的问题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温故一九四二》只是含泪告别过去而欣慰地四顾当下,其意义在于重新把“民族寓言”放在宏大历史叙事与宏大政治叙事之间而将一些严肃问题提出。在此,“温故”就是抵抗遗忘,就是“知新”。

[参 考 文 献]

- [1] JAMESON F.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J]. Social Text, 1986(15): 69.
- [2] 怀特. 元史学[M]. 陈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1.
- [3] 刘震云. 温故一九四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4]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上册[M]. 吴象婴, 梁赤民, 董书慧, 王昶,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4.
- [5] 尼采.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M]. 陈涛, 周辉荣,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6] 莫言. 生死疲劳[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 [7] 朗西埃. 歧义: 政治与哲学[M]. 刘纪蕙, 林淑芬, 陈克伦, 薛熙平,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41.
- [8] 布洛赫. 希望的原理: 第1卷[M]. 梦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69.

(责任编辑: 程晓芝)

The “National Allegory” In The Crevice: The Feature of Dual Narrative and Hiddenness In Remembering 1942

ZHU Zhao-Bin¹, CHEN Si²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Remembering 1942, a very famous and unique work of Liu Zhenyun, is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and nonfictional narration. This work constructs a “national allegory”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famine in Henan Province, which shows the living and spiritual conditions of some Chinese people. Their life was full of hunger, struggle and death, while their spiritual world was full of dullness, selfishness and forgetfulness. This “national allegory” is placed in the gap between the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grand political narrative, and highlights its own significance in the famine in Henan Province,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makes the grass roots gradually forget their struggle in the historical disaster, while the grand political narrative makes people’s interests ignored for the political purpose. In these two grand narratives, the micro-survival of the people and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West are often hidden. The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documentary style of this work confronts the two grand narratives mentioned above, which not only reveals the shielding effect of grand narratives on individual living and spiritual conditions at the micro level, but also clearly marks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western factors. Liu Zhenyun reveals the dual grand narrative in his works, which makes the “national allegory” completely presented, so that people can confront more authentic and extremely complicated history.

Key words: Remembering 1942; national allegory; grand narrative; hiddenness